

理论探索

大文学观刍议

□刘 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观。构建大文学观,要更新文学理念,注重书写丰富多元的主题,强调“兴观群怨”并举,要有多样的写作者参与创作,要有大文体意识和大读者群作支撑,建立文学大循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今天,在文艺剧烈变革的当前,文学需要一场自我革新,走出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既定的创作模式,构建与现实发展相适应的大文学观,推出与时代精神相匹配的文学作品。

构建大文学观,要更新文学理念。一是超越“纯文学”。新时期以来,因为对特殊时期过度承担政治功能的文学不满,于是强调去政治化,倡导纯文学,在内容上重视对“我”的描述,叙事上强调写作技法,一些作家甚至表示写什么并不重要,怎么写才重要,不少作品在叙事上追求“迷宫效应”。在此文学范式下,产生了大量被经典化的作家作品。这批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创作力旺盛,且时有作品问世,影响至今不绝。这样看来,纯文学观的价值和意义重大,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有的作品过于重视自我经验,不能以深广的视野表现变化着的现实,有的作品则过于重视叙事技法而忽略经验的表达,沦为一种语言的游戏。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构建一种大文学观,它既有效吸纳纯文学观的有益成分,又更具包容性,让文学更加有力地反映现实。二是超越“新文学”,晚清以降,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四”诸子,欲师西方之道变中国之道,以应对时艰,但一时难图,故退而求其次,从变“文”始。新文学重视“人的文学”,推动了白话文普及,为中国文学引入西方经验,影响巨大。今天,新文学的传统依然深刻地滋养着我们,我们也需要不断从中获得推动文学发展的经验。但是,新时代文学还需要进一步超越“新文学”,接通古典传统,接通我们的文明根脉,并基于现实新变展开新的创造,催生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经典。

构建大文学观,要注重书写丰富多元的主题。如果作家只是单纯地表现个人生活,描写日常的琐碎,却没有任何诗意提升,那我们的文学就会变得狭窄、琐屑。这样的作品大都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缺少大的背景、大的视野、大的观照。大文学观要突破上述局限,作家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入表现时代变化,深刻展示人民情感,全景式表现现实生活,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学力量。这并不是说,文学只能表现大题材、大故事,而是要用大的视野去观察、写作。真正的“大”,既能“放之弥六合”,亦能“卷之退藏于密”。小人物命运的沉浮、人生的不同际遇、百姓的日常生活、世事变化、人间烟火,都可以是文学的题材,都能因小见大、管中窥天。构建大文学观,要具备世界眼光,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视野,有表现不同国家、民族的生活状态和人类共通的情感命运的大手笔,以优秀作品为世界文学发展提供中国视角、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大文学观当兼容包荒,涵盖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科幻、爱情、悬疑、历史、武侠、推理等领域,均可涌现出好的作品。凡具精彩故事、能回应现实、有深刻思考、给人精神愉悦、予读者有益启迪的作品,都是好的文学。近年,科幻文学异军突起,

《三体》等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作品。这证明,文学创作的关键不在题材本身,类型文学同样能产生大作品。

构建大文学观,要强调“兴观群怨”并举。1980年,钱锺书作《诗可以怨》。此文虽是讨论古代文论问题,实则深入回应当时的中国现实。历经特殊年代,强调诗可以怨,可以纾解社会情绪、宣泄情感、化解矛盾、升华精神。知青文学、伤痕文学、打工文学等,虽各有不同的“伤痕”,分别带着不同的时代讯息,实则都是“诗可以怨”传统的现代变体。但是,“诗可以怨”只是文学功能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唯一标准,似乎不反思批判、底色不灰、不描写阴暗面的文学就不是好的文学。当然,我们也要警惕走向另一种极端,认为文学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今天,时代精神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学应该同时重视“兴观群怨”。所谓“兴”,就是通过文学感动人、鼓舞人、振奋人,明确目标、看到希望,使人民获得奋进的力量。所谓“观”,就是通过文学作品观风察俗、考见得失,理解社会的变化、人民的心理,认识把握现实。所谓“群”,就是促进不同群体、不同文明间交流沟通,打破疏离、消除隔膜,凝聚共识、敬业乐群。

构建大文学观,要求有多样的写作者参与创作。作家是一个近代以来建构的概念。“五四”前后,作家概念确立,逐渐职业化,承担了新民、启蒙的职责。然而现代作家概念的构建是一个排他的过程,既摒弃了传统文人的概念,也忽略了那些通俗文学写作者。今天,作家还可能继续保持其原有的特征,但写作者却变得越来越多样了。文学是公器,应避免圈子化,文学创作要向广大群众开放。近年出现的“素人写作”就扩大了创作群体,丰富了文学题材,拓展了文学的可能性。这些作家来自各行各业,比如范雨素是保姆,王计兵是快递员,陈年喜是矿工,杨素秋是大学老师,王瑛是清洁工。他们身上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和行业讯息,为文学带来了生机活力。作为群体出现的作家群也各有特征,东莞素人写作者多是打工者,往往写工业题材、工厂生活;山西固作家群大都是农民,多写农村生活、打工情况等;江苏坡子街作家群,小工商业主占比较高,写作题材也较为丰富。近年,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网络作家体量巨大。据《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24年新增注册280万人,新增签约35万人。这些作者通过网络平台发表作品,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面向,拓展了文学的可能性。

构建大文学观,要有大文体意识。文体兴衰不定,一度盛行一时的文体悄然不见,一些昔年名不见经传的文体成为显学。当前通行的诸文体是建构而成,亦处在消长过程。“五四”以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构成了我们的基本文体格局,由于一些观念的影响,一些人认为,小说类虚构文学似乎比非虚构类作品更具文学性。但是,在大文学观下,我们应该强调一种大文体意

识,强调虚构与非虚构并重。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出现两次浪潮,成绩斐然。第一次浪潮源于文学界内部对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不满,是文学领域的自我变革。代表性作品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阿来的《瞻对》、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场》等,第二次浪潮与当前的新大众文艺有关,创作主体是素人。他们的作品丰富了当前的文学主题,拓展了文学的空间。比如,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久别重逢》,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郭霞的《我的吊带裙》、陈慧的《有去花的地方》、易小荷的《盐镇》、杨素秋的《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王瑛的《清洁女工笔记》等。近年的非虚构写作提示我们,要打开文体观念,树立大文体意识,构建大文学观既要重视虚构类作品,也要重视非虚构类作品。

构建大文学观,要有大读者群作支撑。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写道:“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读者和作者一体,读者和作者相互需要、彼此砥砺,才能推动文学更好地发展。“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优秀的读者也能推动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过去的一些文学作品,过于强调先锋性、实验性,过于重视叙事技法,不重视故事,与社会现实互动不足,因此也慢慢地流失了读者。尤其是2025年文学图书市场明显下滑,形势严峻。当然原因多样,比如文化产品更加多样、视频挤压文学空间等。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意识到,文学不能脱离读者。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文学的“最后一公里”打通。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会在多样的传播渠道中被读者广泛地接受和认可。文学要寻找读者、启发读者、引导读者,要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学创作固然需要“荒江老屋中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但文学读者则应多多益善,文学作品传播要“破圈”,优秀的作品要有大影响力和大流量。

构建大文学观,要建立文学大循环。如果我们的作品,只是作者写、编辑编、评论家评,然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那么,文学还如何影响读者,如何建立与社会现实的紧密互动?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涉及多方主体,所以,艾布拉姆斯称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为文学四要素。当然,现在还有人提出媒介是“第五要素”。文学活动应该是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媒介等要素的大循环。文学的创作与出版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但必须更好地服务于大循环,即让作家更好地深入生活,让作品更广泛地走进读者。同时,建立文学的大循环,还要注意海外市场和读者,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学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荟报 合办

王干两部新诗集在鲁发布

本报讯 《王干青春诗抄》《缘山路11号》新书发布会暨“青春与后青春的对话——一首跨越时空的生命长诗”文学对话日前在山东青岛举行。“人民艺术家”王蒙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温奉桥,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林滨,中国海洋大学一多诗歌中心主任于慈江,中国海洋大学文学博士霍忠欣与作者王干参与对话。

“我的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很大程度源于诗情,每当遇到困难,支撑我的是一颗诗心。”王蒙在分享自己的诗作《畅游》时表示,写诗是一种精神的需要、青春的需要。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怀念青春、温习青春,为青春而痛哭、为青春而快乐。诗应该形成自己的语言结构,要更精粹化、音乐化,从灵魂出发最终抵达灵魂。

王蒙与林滨共同为《王干青春诗抄》《缘山路11号》两部新诗集揭幕。对谈环节,三代创作者围绕“青春”与“后青春”展开深度交流。大家谈到,从王蒙《青春万岁》序诗中奔涌的理想主义激情到《王干青春诗抄》里沉淀的时代语丝,再到《缘山路11号》中当代青年的多元建构,不同时代的诗心在此交汇,共同勾勒出青春永恒跃动的精神图谱。

专家研讨欧阳娟《天下药商》

本报讯 12月6日,由江西省作协、宜春市委宣传部、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欧阳娟长篇小说《天下药商》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黎隆武出席会议并致辞。宜春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文亮,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姚巍,仁和集团副董事长杨潇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江西省作协主席曾清生主持。

吴义勤表示,《天下药商》书写了江西宜春樟树药商的故事,深刻地触及“义”与“利”对中国商业文化的核心命题。以侯木生为代表的古临江府传统药商,信奉的是将商业信誉和济世救人的社会责任感置于单纯逐利之上,这对当下构建现代商业文明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与会者认为,《天下药商》以明末清初为时代背景,以四位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为线索,描述了临江府药商从偏安一隅发展到遍布天下的经历。小说采取多线并进的复调叙事,形成一种细腻的网状结构,沉稳而扎实地推动故事情节不断向前发展。作品对中医知识、中医辨证哲学的呈现丰富而全面,令人印象深刻,是当前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八方文讯

第四届北京大学王默人一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揭晓

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的第四届北京大学王默人一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杜晓勤等出席并致辞。王德威、罗鹏、孟繁华、王尧、陈福民、林白、曹文轩、陈晓明、李洱等作家、学者,以及王默人、周安仪夫妇亲属王可凡等与会。颁奖典礼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主持。

赵园《灯火》、陈冲《猫鱼》、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获奖。赵园在视频发言中谈到,自己在散文创作中灌注了真挚的情感,使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陈冲说,《猫鱼》的写作让她感受到作为初学者的兴奋和激情,希望永远保有初学者的谦卑心态。毕飞宇表示,写作者都应当承担知识分子记录世道人心的责任。

据悉,“北京大学王默人一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由旅美华人作家王默人和夫人周安仪捐资设立,用于奖励全球范围内用华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

(王泓桦)

雷默高鹏程作品在京研讨

由浙江省作协指导,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农业大学文学院、宁波市文联主办的“东海双雄”雷默、高鹏程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出席并致辞。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赵萍、宁波市文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焦剑以及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主持。

与会专家表示,雷默长期致力于中短篇小说创作,小说叙事扎根于人世间日常生活风景,以克制的笔触书写生命的柔软与坚韧。这种贴近现实的创作,从日常生活经验和伦理视角反映时代变迁,准确表达了现代人复杂幽微的情感状态。高鹏程的诗歌意象繁复、笔法细密、修辞恰切,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其诗歌写作既融入了个人生命经验,又含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诗行之间流动着诗人对生活新的发现,对文明及历史的深入思考。

(张昊月)

“沁园春”词牌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近日,由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陕西省诗词学会指导,榆林市委宣传部、榆林市文联主办的“一阙承今古 千章续雅风——‘沁园春’词牌作品征集活动”在京启动。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陈晋等出席活动。

此次征集活动面向全国广大诗词爱好者征集以“沁园春”为词牌的优秀作品,旨在进一步挖掘和传承诗词文化,激发广大诗词爱好者创作热情,以优秀的作品缅怀伟人、礼赞时代。征稿时间截至2025年12月20日。

与会者表示,《沁园春·雪》不仅是毛泽东主席的经典之作,更是中国诗词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在纪念《沁园春·雪》发表80周年之际举办此次征集活动,有助于从经典中汲取奋进力量,让伟人精神和诗词文化代代相传。

徐祯霞《牛背梁上望长安》新书发布

12月5日,由贾平凹文学馆、商洛市作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徐祯霞《牛背梁上望长安》新书发布会暨系列散文作品座谈会在陕西西安举行。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贾平凹、副主席朱鸿及数十位当地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牛背梁上望长安》是作者长期行走于秦岭生态、深入思考长安历史与人文精神后创作而成的。作为基层作家,徐祯霞聚焦故乡风物人情,凭借细腻的笔触、真挚丰沛的情感,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展现了散文创作的现实关怀与美学价值。徐祯霞表示,自己在这部作品中力图通过文字搭建起自然、历史与当代人之间的精神对话桥梁。

周孟贤抒情长诗创作研讨会举行

近日,由湖州市作协主办的“我和江河同放歌——周孟贤抒情长诗中的情感与哲思”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湖州举行。

周孟贤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从事抒情诗创作,已先后创作发表30余首(部)抒情长诗。在研讨会上,周孟贤讲述了《大鸟引我溯长江》《海上追月》《海中舟》的叙述《我和江河同放歌》等长诗的创作历程。孙昌建、徐良、涂国文、刘树元等与会者从意象、哲思等角度对周孟贤作品展开了深度解读。大家认为,周孟贤的长诗创作注重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在新时代,诗歌

作者要以更多优秀诗作反映时代巨变。

《诗刊》社与嘉应观诗社合办改稿会

11月29日,由《诗刊》社与河南武陟嘉应观诗社共同主办的首届诗歌创作改稿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诗刊》副主编霍俊明与来自全国的10余位诗人、诗歌爱好者参与活动。

此次改稿会采取“面对面、一对一”的方式,编辑在肯定作者“我手写我心”创作初衷的同时,也指出部分诗作在逻辑严谨性、叙事深度方面具有提升空间,建议未来创作要强化原创性,融入更丰富的经验细节,避免同质化写作。与会者表示,此次活动打破了基层写作“闭门造车”的困境,让专业的诗歌创作指导深入基层,解决了大家长期存在的困惑,提升了诗社整体创作水平,有助于推动诗歌创作的良性发展。

杨金亭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刊》社原副主编、《中华诗词》原主编杨金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2月5日在京逝世,享年94岁。

杨金亭,中共党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抗日儿童团并投身抗日宣传工作。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虎坊居诗草》《杨金亭诗选》《村歌晚唱》,诗论《编余诗话》,合著《陶铸诗词选注》《中国百家旧体诗选》等。

金振林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溪流》杂志原主编金振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26日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88岁。

金振林,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虎胆英雄传》《蛇医游侠传》《将军百战死》,纪实文学《巨人的毛岸英》《死亡约会》《天堂陷阱》《张君集团覆灭纪实》,儿童文学《小黑子和青面猴》《小鸟和小孩》《深山追虎记》《罗霄山追踪》等。曾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儿文艺创作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

——由张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说起

□ 孟繁华

书 评

稍微观察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我们便不难发现,虽然文学史细部的研究还在进行,但是,鲜有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史著作推出。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学史作为曾经的显学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二是年轻的文学史研究者越来越稀缺。这是一个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张炯先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出版于2022年,是最为切近的一部具有文学史同等价值的小说史。这当然和张炯先生的学术积累和专业背景有关。张炯毕业于北京大学,工作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两个单位都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镇。除了文学的现场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外,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亦是张炯的重要工作内容。比如,他曾主编《中华文学通史》,担任过《中国新文艺大系·史料集》的主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常务副编委,参与主编过《中国文学通典》,2014年又撰写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史》。这些工作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史写作经验。他编撰《中国现当代小说史》,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部小说史的起始时间有别于以往著作。一般的文学史都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将中国新文学的起始时间向前推进到1890年。这一年,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在法国发表。法国文学史不会写到陈季同和《黄衫客传奇》,我们对此也要熟视无睹吗?因此,将《黄衫客传奇》的发表视为“新文学的开始”,是严家炎先生非常了不起的发现。现在,张炯先生将《中国现当代小说史》的起始时间定在1911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历史感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化影响并不构成完全对应的关系。所以,张炯先生从这个时代开始他的“现代”,也有充分的道理。

这部小说史的主体内容,基本是由作家作品构成的。张炯先生敢于立论,敢于指认哪些作家可以写进文学史。特别是对于当代作家,这一点尤为困难。这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胆识。我们知道,一般的文学史,包括小说史,大多是由“文学事件”和文学本体构成的。“文学事件”,不单纯是文学或文化事件,背后都有鲜明的政治性。“史学化”的强化,削弱了文学史的“本体性”。文学史的“本体”应该是什么?朗松强调,文学史认识的主要客体,应该是文学作品。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讲述——其谱系、传承关系,其创造性、新的审美经验以及文本分析,是文学史的“本体”。

近年出版的鲍鹏山的文学史《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从《诗经》讲到《红楼梦》,基本是以作家作品为主。他断言,这5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中国人的心灵史”。他的一些断语是否正确,是否被古代文学史界接受,是另外的问题,但他讲了文学史的“本体”,这个观点和路径是正确的。从这部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鲍鹏山没有过多地讲述“历史”,也没有涉及太多的文学“事件”。他在建构他的文学史时,选择的基本都是经典作家作品。他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古代中国心灵的理解。这种方法,古代文学可以做到,因为古代文学已经历过了历史化和经典化,有公认的作家和作品。但当代文学史要困难许多,因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还没有完成。因此,有“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的差别。

最近,我们也看到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他采用了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朴素流动”;然后,“选定时间、议题,以小见大,作出散点、辐射性的陈述”。他不强求一家之言的定论,在意的是对话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王德威的体例中也有文学的“事件”,比如1952年的“文学史的开端”、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等。